

# 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的 数智化重构及其迷思破除<sup>\*</sup>

巩永丹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发起了激进批判，致力于重构共产主义。自治主义者聚焦“一般智力”，提出了数字共同性构想和后福特制共产主义；激进左翼基于对数智奇点前景、技术封建主义、数智监控技术、食人资本主义的批判，推出了新共产主义“观念”；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立足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建构了数字共产主义、全自动化奢华共产主义和数智“异托邦”图景；左翼加速主义者基于加速社会批判，推出了加速式、共鸣式或减速式方案。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的数智化重构以超历史假设、抽象政治和神秘主义为立论基础，在方法上抛弃历史辩证法，陷入了“历史终结论”；在理论上抛开唯物史观，陷入了“技术乌托邦”；在主体上放弃无产阶级，陷入了理想主义。我们要警惕西方左翼推行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奇点来临论”和“技术决定论”，回归历史辩证法，坚定道路自信，坚持政党领航，以中国式现代化破除共产主义迷思，创造共产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

**【关键词】** 西方左翼 共产主义 数智化 技术乌托邦 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 巩永丹（1990-），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首都高校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 100191）。

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加速更新和普遍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及其组织方式和资本增殖形式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从世界历史视野看，当今资本主义已经迈入后现代或后福特制阶段。在此阶段，资本不断圈占机器与技术，侵蚀人的日常生活，捕捉人的智力和注意力，渗入并吸纳人的情感和情绪，甚至将人类裹挟进没有间歇、全天候运转的“24/7式的资本主义”<sup>①</sup>体系之中，人类为资本提供全天候服务。如果说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主要处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阶段，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则走向了对人的身体、精神和智力的深度控制，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在后现代时期，在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阶段，资本似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独立。”<sup>②</sup>在此阶段，当代西方左翼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形态，其中“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正在以一场技术革命推动21世纪的动态发展”<sup>③</sup>，数智时代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十足的“数字技术金融资本主义”<sup>④</sup>。在数字技术金融资本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加速蔓延和全球扩张的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左翼新共产主义思潮的理论谱系及误区批判研究”（24CKS122）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 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河西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17页。

② [美] 迈克尔·哈特、[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王行坤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③ Göran Therborn, “The World and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Vol. 137, Sept/Oct 2022.

④ Göran Therborn, “The World and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Vol. 137, Sept/Oct 2022.

背景下，以自治主义者、激进左翼、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加速主义者等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发起了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致力于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数智化解读，期望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的全面超越。近年来，西方世界接连丛生的各种乱象加速了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解剖，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导致一种新封建主义的诞生”<sup>①</sup>，“人类文明正沿着一道山脊走向完全归属于资本的无望时刻”<sup>②</sup>；强调“共产主义不是隧道尽头的光”<sup>③</sup>，而是永恒的观念；对抗大数据资本主义，力推“数字社会主义”<sup>④</sup>和“数字共产主义”<sup>⑤</sup>；呼吁“共产主义不是可能的选择，而是唯一的选择”<sup>⑥</sup>，认为“在资本主义进入最黑暗的历史时刻，新世界的曙光开始闪烁”<sup>⑦</sup>。当代西方左翼批判资本主义的直接目的是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激活“反资本主义运动”<sup>⑧</sup>，通过建构新的共产主义来开启新的解放之路。

## 一、生成谱系与发展动态：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的数智化重构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拒斥和反叛之声不绝于耳，“共产主义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错误”<sup>⑨</sup>，甚至被直接宣判死刑。此后的十余年，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趋于低迷，甚至走向忧郁的境地。当代西方左翼真正开启对资本主义的爆发式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全方位建构，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数智技术的新发展。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短板弱项，折射出信息产业也会加剧资本主义危机。在此背景下，以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斯拉沃热·齐泽克、阿兰·巴迪欧、吉奥乔·阿甘本、保罗·维尔诺等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学者集体亮相，尝试重新激活共产主义，建构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一时期，“共产主义的回归给左派注入新的活力。共产主义再次成为表达普遍的、平等主义的、革命的理想的话语和词汇”<sup>⑩</sup>。此外，随着“云大物移智链边”和“GAFA”<sup>⑪</sup>的深度发展，乔迪·迪恩、塞德里克·迪朗、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艾伦·巴斯塔尼、南希·弗雷泽等左翼学者也纷纷著书立说，推出了数智时代共产主义的新版本，共同探寻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方案。

### 1. 自治主义的数字共同性构想和大同世界图景

在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思想光谱中，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可谓“独树一帜”<sup>⑫</sup>。21世纪以来，

① Jodi Dean, “Communism or Neo-Feudalism?”,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1, 2020.

② [法] 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陈荣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96页。

③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p. 149.

④ Evgeny Morozov, “Digital Socialism? The Calcul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Left Review*, Vol. 116/117, Mar/June 2019.

⑤ Christian Fuchs, “Karl Marx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 in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p. 68.

⑥ Slavoj Žižek, *Heaven in Disorder*, New York and London: OR Books, 2021, p. 221.

⑦ [英] 菲尔·琼斯：《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陈广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第131页。

⑧ [英] 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王立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6页。

⑨ Rossana Rossanda, “Two Hundred Questions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Be Communist in the 1990s”, in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61.

⑩ Jodi Dean, *The Communist Horiz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p. 8.

⑪ “云大物移智链边”是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边缘计算等先进数字科学技术的统称，“GAFA”指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等大型科技公司。

⑫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意大利左翼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莫里齐奥·拉扎拉托、保罗·维尔诺等人为代表。他们把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段”奉为“圣经式文本”和“先知式预言”，尝试以马克思提到的“一般智力”概念解释后现代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探索新的共产主义道路。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营建的“加州意识形态”和数字帝国，推出数字共同性构想和后福特制共产主义方案，勾勒了共产主义的数智化全景图。

第一，作为“加州意识形态”批判的“另类共产主义”。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在美国加州的崛起，以“一般智力”为代表的网络技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深度融合。西方学者借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将这一趋势形象地称作“加州意识形态”<sup>①</sup>，它代表了数字技术乌托邦幻想。法国左翼学者杨·莫利耶-布唐指出：“加州数字革命的意识形态与‘网络共产主义’有着异常暧昧的关系。”<sup>②</sup>在“加州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我们目睹了数字共同性的破坏”<sup>③</sup>。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批判“一般智力”与资本主义深度融合形成的数字帝国来推出他们的另类现代性方案的。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互联网技术推动资本真正实现了全球化，“加州意识形态”引发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已经遍布世界角落，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资本主义正在改变人们的劳动形式。这正是马克思预言的“一般智力”的现实化。当前，人的劳动正在变成科技劳动、智识劳动和赛博格劳动，“这些新的劳动形式直接就具有社会性，因为它们直接决定了那些创造和再造社会的生产性协作所构成的网络”<sup>④</sup>。对此，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以“加州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后现代资本主义正在向全社会渗透其资本增殖逻辑，整个社会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法则掌控。要改变这种惨况，必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建构“法律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摧毁”<sup>⑤</sup>。法律共产主义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它“意味着提出一个有效的另类方案”<sup>⑥</sup>，即通过对构成高科技资本主义的法律和国家机器进行全面分析，以期激活共产主义的潜能，打造共产主义的主体，开辟超越资本主义法权和国家—形式的后现代道路。

第二，超越数字帝国规训的“共同性共产主义”。共同性是自治主义对公共资源或公地的一种叙事，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话语中，“数字共同性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sup>⑦</sup>。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sup>⑧</sup>。资本增殖的过程就是不断创造差异性、制造多样性需求的过程。在数智时代，资本不仅圈占自然资源、制造自然消费品的差异性，而且通过宰制人的“一般智力”和智力劳动，制造数字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差异性。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资本制造差异性的过程就是把公共品和公共资源私有化的过程，资本实现全球化并营建帝国的过程，就是资本剥削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情感、符码、图像和交往等共同性和共有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资本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人类的出路就是剥夺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夺，摧毁数字帝国对诸众的宰控，即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从而“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sup>⑨</sup>。奈格里认识

① Richard Barbrook and Andy Cameron,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From Dot-com Capitalism to Cybernetic Communism*,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2015, p. 12.

② Yann Moulier 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1, p. 49.

③ Donatella Della Ratta, “Digital Socialism Beyond the Digital Social: Confronting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with Ethics of Care”, *TripleC*, Vol. 18, No. 1, 2020.

④ [美] 迈克尔·哈特、[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王行坤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⑤ [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

⑥ [美] 迈克尔·哈特、[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王行坤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3页。

⑦ Sébastien Shulz, Mathieu O’Neil, Sébastien Broca and Angela Daly, “Digital Commons for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Ethics, Praxis and Policies”, *TripleC*, Vol. 22, No. 1, 2024.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

⑨ [美] 迈克尔·哈特、[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2页。

到，仅仅依靠诸众反抗帝国和拒斥共同性是远远不够的，而要充分利用共同性，激活人类对共同性的共享和占有，实现“私有财产向共同性的转变”<sup>①</sup>。他认为，“共同性”是人类生产的新形式，“‘共同性’作为一种起始的现实，由此出发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计划成为可能”<sup>②</sup>，这种新共产主义模式是“共同性共产主义”<sup>③</sup>，亦即共享共同性的大同世界。

第三，替代“资本的社会主义”的“后福特制共产主义”。在后福特制时期，资本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语言交流、智力活动和精神生活也深受资本的侵蚀，资本日益控制着人的主观世界，“如果说福特主义将消费融入资本再生产的循环，那么后福特主义则将交往融入其中”<sup>④</sup>。在此背景下，西方左翼意识到，随着马克思“机器论片段”中的“一般智力”变成现实，“资本的共产主义的理念不再是乌托邦，而是时代精神和当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架构”<sup>⑤</sup>。“资本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sup>⑥</sup>，而是一种“后福特制共产主义”。它源于后福特制下“一般智力”与人的劳动、认知和交流的综合，其中以“一般智力”为特质的知识、想象力和思维方式等成为劳动的主导形态。在此背景下，智力活动不可能再被简化为“简单劳动”<sup>⑦</sup>，而是涵括人的智力、知识和语言交流等精神世界在内的非物质化劳动。意大利左翼学者维尔诺强调：“在后福特制时代，由于‘精神生活’已完全被列入生产的时空之中，其中必要的同质性已占主导地位。”<sup>⑧</sup>维尔诺着眼于后福特制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了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的新方案，强调后福特制生产方式和劳动形态的变化开启了共产主义的帷幕，即“资本的共产主义”。维尔诺宣称，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经历凯恩斯革命创造了“资本的社会主义”，那么后福特制则以“一般智力”生产为特质创造出新的共产主义。“后福特制以其自身的方式提出了典型的共产主义要求（取消工作、解散国家等）。后福特制是资本的共产主义。”<sup>⑨</sup>显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真正条件，但维尔诺误认为以“一般智力”生产为核心的后福特制就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版本，这种理解背离了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和剥削逻辑。

## 2. 激进政治批判语境中的“技术奇点”和新共产主义观念

21世纪以来，“数智技术决定论”“数智技术奇点论”甚嚣尘上，“反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广泛流传”<sup>⑩</sup>。基于此，激进左翼学者针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以替代资本主义为政治目标，不断把共产主义“观念化”“事件化”“政治化”，强调“‘共产主义’是激进哲学和政治的理念”<sup>⑪</sup>，打造了激进政治的实践方案。

第一，作为终结资本主义的“奇点共产主义”。“奇点”是西方学者分析数智时代人类命运的重

① Antonio Negri, “The Appropriation of Fixed Capital: A Metaphor?”, in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p. 213.

② Antonio Negri, *The Comm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23, p. x.

③ Michael Hardt, “The Common in Communism”,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2, No. 3, 2010.

④ 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140.

⑤ Yann Moulier 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1, p. 7.

⑥ [美] 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1页。

⑦ Paolo Virno, “The Ambivalence of Disenchantment”, in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22.

⑧ [意]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4页。

⑨ [意]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6页。

⑩ [英] 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王立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3页。

⑪ Slavoj Žižek and Costas Douzinas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p. ix.

要概念。库兹韦尔在《奇点更近》一书中指出，奇点代表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融合的顶点，“人类迈向奇点的千年征程已经步入冲刺阶段”<sup>①</sup>。齐泽克借用“奇点”概念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构造出基于连线大脑的庞大数字网络的“奇点共产主义”。齐泽克认为，在数智技术高速进化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成为“大他者”的最新化身，“在不远的将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算法的力量将生产出‘身体、大脑和心灵’”，大脑连线将创造出一种超现实的后人类图景，如此共产主义就成为一种无比激进的“宇宙事件”。齐泽克认为，奇点是灾难的终点，但“奇点前景打开了一种走出资本主义的方式”，是一种后人类状态。齐泽克乐观地认为，即便奇点终结了资本主义，人类依然可以筹划自己的行动，“奇点概念的问题并不是它太过‘激进’或太像‘乌托邦’，而是它还不够激进”<sup>②</sup>。齐泽克对奇点共产主义的筹划是一种观念论共产主义，他把它看作由奇点引发的“宇宙事件”。与此相似，激进左翼学者巴迪欧通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建构了一种“假设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观念论形态。在巴迪欧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已经陷入系统性危机，迫切需要用全新的方式来整合现实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假设则是指，一种不同的、将消灭财富的不平等甚至劳动的分工的集体性组织是可行的”<sup>③</sup>。巴迪欧认为，只有通过确定我们在“共产主义假设”中所处的位置，才能重新激活共产主义的现实版本。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假设，也是一种观念，更是一个个反抗事件，这种“共产主义观念与事件相关，因为事件总是在创造新的可能”<sup>④</sup>。巴里巴尔也认为，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理念或承诺，“共产主义并不是唯一的观念”，“观念论是共产主义承诺的条件，或者说它是这种承诺的哲学名称”<sup>⑤</sup>。巴里巴尔强调的作为“承诺”的共产主义在本质上等同于作为“理念”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也是齐泽克极力推崇的。齐泽克反复呼吁，“共产主义假设仍然是正确的假设”<sup>⑥</sup>，这种“共产主义通过回归‘共同性’概念对抗资本主义的私有化，以期建立一个新的大同世界”<sup>⑦</sup>。

第二，超越“技术封建主义”的新共产主义设想。美国左翼学者迪恩针对当下资本主义对共有物、数字-智能技术的圈占而发起强烈批判。在迪恩看来，交往资本主义的垄断集中、不平等加剧、国家受制于市场，正在引致新封建主义。“交往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共产主义或新封建主义”<sup>⑧</sup>，“在全球不平等加剧和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新封建资本主义剥夺社会盈余的灾难是真实的”<sup>⑨</sup>。与新封建主义类似的有“技术封建主义”“数字封建主义”“信息封建主义”<sup>⑩</sup>。所谓新封建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就是指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具有类似于封建主义的特征”<sup>⑪</sup>，数字资本裹挟着新技术在新一轮的扩张中逐渐使数字平台、网络技术和一般智力等成为新的“领土”，“数字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一种技术封建主义逻辑”<sup>⑫</sup>，数字科技巨头成为新的封建主和食利者，普通民众和数字平台用户则成为新农民或云农奴。今天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

① [美] 雷·库兹韦尔：《奇点更近》，芦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年，第6页。

②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连线大脑里的黑格尔》，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9、256、228页。

③ [法] 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罗久译，见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④ Alain Badiou, *Philosophy and Even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3, p. 14.

⑤ Slavoj Žižek (ed.), *The Idea of Communism 2: The New York Con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p. 15.

⑥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p. 87.

⑦ Slavoj Žižek and Costas Douzinas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p. ix.

⑧ Jodi Dean, “Communism or Neo-Feudalism?”,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1, 2020.

⑨ Jodi Dean, “The Neofeudalising Tendency of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TripleC*, Vol. 22, No. 1, 2024.

⑩ Evgeny Morozov,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New Left Review*, Vol. 133/134, Jan/Apr 2022.

⑪ Cédric Durand, “Scouting Capital’s Frontiers”, *New Left Review*, Vol. 136, July/Aug 2022.

⑫ [法] 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陈荣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77页。

种模式叠加的产物，是复杂的数字、通讯技术、信息网络被脸书、推特、苹果、微软等国际数字资本寡头垄断的结果。这种新封建主义引发了新的等级划分，制造了1%与99%的对抗，形成了网络幂律分布中的“长尾”，造成新的强制和剥削。要超越新封建主义必须激活共产主义观念，“避免或直面这一局面需要为共产主义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sup>①</sup>。基于此，迪恩强调新封建主义的唯一替代选择是新共产主义。

第三，数智监控技术批判与“救赎”的共产主义。激进左翼学者阿甘本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景观，对数智监控技术引发的人的身体和心灵异化进行了批判，对人类未来命运作出臆测和想象。阿甘本认为，当下的数智技术已经嵌入人的身体和心灵，特别是指纹识别、电子芯片、数字照片、DNA数据库、光学生物识别仪等对人进行全面扫描和监控，人沦为“无人格的身份”，变成“赤裸生命，一组纯粹的生物学数据”<sup>②</sup>。基于此，他借用西方文化中弥赛亚的预言设想出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这个即将来临的世界是对当下资本主义情境的超越，因为当下资本主义正在将人的生命变得支离破碎，使人如同活死人一般。在阿甘本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着虚假的信息和闲散，而且制造着劳动的苦役、无用的消费和虚假的景观。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将面临更强大的资本宰制和“小资产阶级”的控制。要改变这种普遍的历史状况，只能创造一种共同存在的新形式，即“来临中的共同体”。阿甘本对这个共同体的描述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他认为这种共同体是一个被救赎的无阶级社会，是在人人互爱中建立“爱的共同体”<sup>③</sup>的尝试。这种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神化”的塑造，如同法国学者让-吕克·南希笔下的“共同体”一般，是一种“人人皆兄弟、对人类的家庭般的内在性的发明”<sup>④</sup>，是依据宗教爱的原则来思考和建构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承诺，“要想实现一场真正激进的革命，需要的是爱”<sup>⑤</sup>。显然，阿甘本设想的这种共同体已经远离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意蕴，而是一种充满主观色彩和宗教色彩的虚幻共同体。

第四，超越食人资本主义的“扩展版社会主义”。美国学者弗雷泽强烈批判当下资本主义对人类公共资源的吞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正在毁灭人类的共同家园。她将当代资本主义称作食人资本主义，认为它正在吞噬人类的生存基础。弗雷泽指出，“食人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当下危机所依赖的系统”<sup>⑥</sup>，它催生了一系列广泛复杂的社会斗争，引致了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瘟疫、军国主义、种族暴力等普遍的灾难。在她看来，食人资本主义正在将我们“烤焦”，资本巨兽正在将人类变成它的饕餮盛宴，废黜这个食人的制度体系的最可靠方案就是“扩展版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应然的版本，而是“一个扩展版的社会主义概念”，“它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仅要克服阶级统治，还要克服性别不平等、种族/民族/帝国压迫以及全面的政治统治”<sup>⑦</sup>。弗雷泽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超越食人资本主义这个巨兽。她主张在21世纪扩写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让社会主义不再是纯粹的流行语或历史遗迹，而是在实践中变成真正替代资本主义的名称。

### 3.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与数智技术批判理论的“替代方案”

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景观和最新表现，这种资本主义如同贪婪的衔尾蛇，正在吞噬人类的共同财富。对此，以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高举批判大旗，在对

① Jodi Dean, “Communism or Neo-Feudalism?”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1, 2020.

② [意] 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5页。

③ [意] 吉奥乔·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相明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6页。

④ [法] 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同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⑤ Srećko Horvat, *The Radicality of Lov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p. 83.

⑥ [美] 南希·弗雷泽：《食人资本主义》，蓝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序言”第5页。

⑦ [美] 南希·弗雷泽：《食人资本主义》，蓝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46页。

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批判中推出新的替代方案。

第一，替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共产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在数字与资本合谋的时代，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是通过数字社会主义走向数字共产主义。他们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可以实现数字社会主义解放承诺的核心空间”<sup>①</sup>，“我们应该承诺设想一种超越硅谷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数字社会主义形式”<sup>②</sup>。福克斯聚焦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提出了“超越大数据资本主义，走向辩证的数字现代性”的共产主义设想。福克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走向了大数据资本主义，它不断圈占数字技术、通信、数字产品和数字公共品，使数字劳动力不断商品化，最终可能使世界变成一个大型购物中心，人类几乎成为广告的目标。在此背景下，福克斯指出，“数字资本主义面临着数字资本与数字公域（digital commons）之间的矛盾”<sup>③</sup>，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深化了对数字劳动力的剥削，而且为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自治王国创造了新的基础。为此，福克斯强调，21世纪人类到达一个历史的分歧点，未来尚不确定，我们要么选择走向超级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核世界大战中地球的彻底毁灭和人类的毁灭，要么走向另一个共同性的社会，即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大同世界”。福克斯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存在于人们抵制资本主义、争取自由空间的每个地方，“大同世界只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一个可能结果”<sup>④</sup>。这个结果可能不尽人意，人类真正的出路是“用公有化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把数字劳动转化成为数字工作”<sup>⑤</sup>，走向“数字共产主义”<sup>⑥</sup>。尽管数字共产主义预示了一个新的乌托邦式的未来，但它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而是变形的资本主义。

第二，适应于数字-智能化前景的“奢华共产主义”。针对高科技带来的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西方左翼学者巴斯塔尼发起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了新的共产主义设想。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正在创造一个用机器替代工人的“永无止境的自动化循环”<sup>⑦</sup>，要突破这个生产的“死结”，必须充分利用自动化、高科技、基因工程、3D打印等造就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使人类不断摆脱稀缺和匮乏状况，进入奢侈和富饶的王国，即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王国”。在此基础上，巴斯塔尼设想了一种全自动化的奢华共产主义（FALC）。他认为，技术进步将破除稀缺引发的种种矛盾，从而把人类引向奢侈、富裕和自由的王国。全自动化奢华共产主义表达了一种高科技共产主义的倾向，但它是开端而非终点<sup>⑧</sup>。这种共产主义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是一种虚幻的构想，因为“共产主义需要技术基础，但仅靠高科技是不够的”<sup>⑨</sup>。

第三，迈向自动化幽灵引致的“乌托邦”或“异托邦”。美国学者彼得·弗雷兹认为，21世纪有

① Dimitris Boucas, “Theory, Reality, and Possibilities for a Digital/Communicative Socialist Society”, *TripleC*, Vol. 18, No. 1, 2020.

② Donatella Della Ratta, “Digital Socialism Beyond the Digital Social; Confronting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with Ethics of Care”, *TripleC*, Vol. 18, No. 1, 2020.

③ Christian Fuchs, “Karl Marx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 in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p. 54.

④ Christian Fuchs, “Karl Marx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 in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p. 67.

⑤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72页。

⑥ Christian Fuchs, “Karl Marx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 in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p. 68.

⑦ Aaron Bastani,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9, p. 52.

⑧ Aaron Bastani,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9, p. 242.

⑨ Christian Fuchs, “Communicative Socialism/Digital Socialism”, *TripleC*, Vol. 18, No. 1, 2020.

两个幽灵笼罩着地球，即自动化和生态灾难幽灵。自动化预示着大规模失业的来临，生态灾难预示着人类普遍危机的迫近。这两种危机“关乎稀缺和丰裕的分配，关乎谁将承担生态破坏的代价，谁将享受高效的自动化经济的益处”<sup>①</sup>。基于此，弗雷兹认为，尽管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但决定人类未来的不是技术而是政治和生态环境。由此，他设想智能化趋势下人类走向未来的四种形态：基于平等和丰裕的共产主义、基于等级制和丰裕的租赁主义、基于平等和稀缺的社会主义、基于等级制和稀缺的灭绝主义<sup>②</sup>。弗雷兹设想的这四种未来实际上是“后稀缺社会的替代结果”<sup>③</sup>，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选择题，既代表马克思意义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美好世界，也可能代表噩梦般的异托邦未来。面对既确定又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应该建立集体力量，为我们想要的未来而战”<sup>④</sup>。

#### 4. 左翼加速主义者基于“数智竞速学”的后资本主义蓝图

“竞速学”是法国学者保罗·维利里奥在《速度与政治》一书中推出的概念，“速度”是竞速学的理论内核，是用以分析社会生活和时空演变的重要维度。左翼加速主义借用“竞速学”范式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及其技术加速的现实，提出现代社会是典型的加速社会，强调当代资本主义依托技术进步走向增长逻辑的加速，直接导致社会遽变、生活步调加快、空间逐渐萎缩、时间愈加稀缺、人的意义感的缺失和“个体经验流的加速”<sup>⑤</sup>。可以说，“21世纪社会的本质或者说它的基本驱动，就是加速”<sup>⑥</sup>。在资本裹挟数智技术疯狂挤占人的生存时空的趋势下，人们如何实现“速度的解放”，摆脱加速的钳制，左翼加速主义者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亚列克斯·威廉姆斯与尼克·斯尔尼塞克提出了以加速应对加速的道路，即“加速技术发展的进程”，以“加速”解放潜在的生产力，最终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走向外部的普遍可能性”<sup>⑦</sup>。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提出了不同于加速社会的异化的共鸣式方案，强调构建人与世界的共鸣关系，实现主体与世界彼此之间声音的响应，最终建立后资本主义美好生活的“共鸣”经验<sup>⑧</sup>。也有学者提出以减速应对加速的道路，即通过数字减速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数字减速”<sup>⑨</sup>，最终建立超越加速社会的减速社会政治模式。

## 二、症候诊断与误区检视：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数智化重构的三重迷思

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学者集体亮相，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对当代资本主义发起理论批判，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接近一个世界末日般的零点”<sup>⑩</sup>。基于此，他们批判了数字资本主义、大数据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食人资本主义、焦土资本主义等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并在批判的基础上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方案，建构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后现代道路。但是，这些共产主义方案以超历史假设、抽象政治逻辑和神秘主义为立论基础，存在着“神学政治”“历史终结论”和“虚无缥缈论”倾向，偏离了唯物史观视域中共产主义的生成逻辑，最终陷入数智时代

① Peter Frase, *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p. 23.

② Peter Frase, *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p. 29.

③ Aaron Benanav,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 I", *New Left Review*, Vol. 119, Sept/Oct 2019.

④ Peter Frase, *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p. 150.

⑤ [德]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⑥ [英]罗伯特·科尔维尔：《大加速：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张佩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336页。

⑦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ian (eds.), *#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362.

⑧ 参见[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9页。

⑨ Jamie Ranger, "Slow Down! Digital Deceleration Towards a Socialist Social Media", *TripleC*, Vol. 18, No. 1, 2020.

⑩ Slavoj Žiž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p. x.



的新乌托邦迷思。

### 1. 方法迷思：抛开历史辩证法的建构与神秘主义倾向

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未来趋势，确证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辩证法”，是我们认识当下、把握未来的金钥匙。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历史按照经济的社会形态向前发展，这一趋势在总体上又体现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sup>①</sup>。共产主义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更高的阶段”<sup>②</sup>，即社会历史的高阶形态，但它决不是天才思想家“头脑的猜想”，而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sup>③</sup>。所谓“历史事实”，就是历史生成和变革的具体的实在关系。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时，相应的社会形态也会发生变迁。所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就构成“历史的发展过程”，共产主义就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极高阶段”的产物。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人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深刻体现了历史辩证法，即从人的视角看，社会历史按照“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的发展逻辑跃升，共产主义就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实现，它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的新世界<sup>④</sup>，它“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sup>⑤</sup>。所以，如果抛弃唯物史观，不从历史事实出发，共产主义就会沦为虚幻的神秘主义，“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sup>⑥</sup>。由此观之，西方左翼学者推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方案几乎都抛弃了唯物史观，他们要么从“法律”“资本”或“共同性”出发设计资本主义性质的共产主义，要么从观念、假设或承诺出发设想神秘的共产主义，要么从高科技或大数据出发急切呼唤数字共产主义的来临，从而偏离了共产主义的真正生成道路。比如，齐泽克反复呼吁“共产主义，再来一次”<sup>⑦</sup>，强调“从头开始”，但他却主张告别社会主义，错误地认为“互联网已经‘自在’地是共产主义的”<sup>⑧</sup>，强调“正如在军事行动中应该共享信息并充分协调计划一样，我提出的今天所需的共产主义亦是如此”<sup>⑨</sup>，这种论断已经将共产主义激进化、神秘化了。拉扎拉托和维尔诺呼吁“资本的共产主义”，把资本当作救命稻草，因而“只能满足一个虚拟的共产主义的要求”<sup>⑩</sup>。巴迪欧把共产主义“事件化”，阿甘本把共产主义“弥赛亚化”和“宗教化”，福克斯把共产主义“数字化”，巴布鲁克把共产主义“网络化”，巴斯塔尼把共产主义“全自动化”，弗雷泽把共产主义“扩展化”，哈特和奈格里强调共产主义是“一头令人恐惧的怪兽”<sup>⑪</sup>，弗雷兹“将社会科学的工具与推想小说的工具相结合”<sup>⑫</sup>，把共产主义科幻化，等等。这些抽象的观点要么呼唤共产主义快点来临，要么强调共产主义遥不可及，要么认为“共产主义（共同体主义/共通体‘主义’）是一个本体论命题”<sup>⑬</sup>，要么主观标定共产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

⑦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p. 77.

⑧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7页。

⑨ Slavoj Žižek, *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and London: OR Books, 2020, p. 67.

⑩ [意]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7-18页。

⑪ [美] 迈克尔·哈特、[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王行坤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⑫ Peter Frase, *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p. 24.

⑬ [法] 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义到来的“终结的时间”<sup>①</sup>，从而将共产主义从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的高阶形态中剥离出去，最终炮制了既不能实现又缺乏依据的历史悬设和神秘景观。

## 2. 理论迷思：抛弃唯物史观的经济方案与技术乌托邦主义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共产主义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或经济力量作为支撑，即真正的共产主义必然建立在“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sup>②</sup>的基础上。这种共产主义首要的“经济因素”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社会化生产资料都已经成为公共财产，“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sup>③</sup>。这充分说明，共产主义的实现有着极为严苛的“经济条件”，在理论要旨上至少关涉“财产公有”“产品丰裕”“按需分配”等经济论题。除此之外，共产主义还关涉人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这种解放政治的价值旨趣也是从经济（财产）领域生成的，即“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sup>④</sup>，是对资本宰制下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资本增殖与人的贬值、物的丰裕与人的贫困等“悖论性问题”的彻底解答，因而也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由此，实现共产主义意味着人类整体上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意味着人类彻底摆脱了外在必然性的限制，从必然王国跃迁到自由王国。所以，共产主义最终指向人类的双重胜利，“一个是克服了阶级统治的胜利，另一个是克服了异化畸变的胜利”<sup>⑤</sup>。与马克思经典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旨不同，西方左翼推出的共产主义方案完全忽略了经济因素，他们力主共产主义的技术基础，从而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虚无主义怪圈。比如，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主张建立数字社会主义的技术基础，却声称这种社会主义与知识生产无关。巴迪欧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与经济相关，而是与事件相关。他把经济看作社会存在中的“特殊领域”，并将它排除在真理-事件的可能性场所之外，由此，“巴迪欧在经济的‘腐败’力量和共产主义理念的纯粹性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sup>⑥</sup>。齐泽克则妄图割断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扬弃私有制的过程，而是数字机器大他者引发的后-人类奇点图景，即“共产主义是一种共享的经验空间，预示了奇点的灵知式观念”<sup>⑦</sup>。当巴迪欧、齐泽克、巴里巴尔、阿甘本等左翼学者在观念化、事件化、承诺化或弥赛亚化的话语逻辑中重构共产主义时，他们的共产主义已经褪去“经济因素”的底色，成为“纯粹假设的共产主义，一种无法在理想与现实、政治与历史、永恒哲学与当今不和谐现实之间进行调解的共产主义”<sup>⑧</sup>。虽然哈特和奈格里主张“将共同性置于经济生活的中心”<sup>⑨</sup>，强调以共同性的共产主义代替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但他们却强调“共同性介于公有和私有之间”<sup>⑩</sup>。他们没有考虑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分配问题，以至于“奈格里的共产主义概念惊人地接近于‘后现代’数字资本主义”<sup>⑪</sup>。尽管巴斯塔尼认为人工智能、3D打印等高科技催生的全自动化的奢华共产主义以“工作被消除，稀缺被丰裕

① [意] 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9-7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⑤ [美] 罗伯特·L.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⑥ Slavoj Žiž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p. 183.

⑦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连线大脑里的黑格尔》，朱羽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7页。

⑧ Bruno Bosteels, *The Actuality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1, p. 17.

⑨ [美] 迈克尔·哈特、[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0页。

⑩ [美] 迈克尔·哈特、[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

⑪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p. 56.

取代,劳动和休闲相融合”<sup>①</sup>为表征,但这种共产主义却忽略了工作或劳动对于人的解放的意义,特别是忽略了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所有权和分配问题,因而陷入技术乌托邦的泥淖。所以,西方左翼要么拒斥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要么对共产主义进行神话叙事,要么畅想共产主义的技术特质,而没有在逻辑与历史、理想与现实的唯物辩证法中理解共产主义的可能性、长期性和现实性。

### 3. 主体迷思:塑造多样化反抗主体与革命理想主义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力量。“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sup>②</sup>可以说,共产主义就是以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理想社会,它的核心要义深刻体现为对历史主体之人的价值关涉和对无产阶级政治使命的历史叙述。由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sup>③</sup>。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解放而虚设的道义承诺,而是从现实出发促进人的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的运动,而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的真正主体,其最现实的目标是消灭它的对立面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sup>④</sup>,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推动新社会的开启。与此不同,西方左翼推出的共产主义方案并不以无产阶级为解放政治的主体,而是重新打造多样化的反抗主体。他们“通过呼吁‘人民’和激进民主,克服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对抗金融化资本主义的难题”<sup>⑤</sup>。他们经常呼吁“我们是99%”,主张共产主义的政治解放运动就是“99%反抗1%”<sup>⑥</sup>,他们重塑“人民”概念并将它作为主体力量。在西方左翼看来,21世纪共产主义的主体力量内嵌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类的解放前景不是消除异化,而是“应付奇点前景”,即“在大他者当中重建异化,将异化视为主体性的构成要素”<sup>⑦</sup>。他们认为,当今的政治主体就是“全世界的知识工人”<sup>⑧</sup>,既有被主流阶级筛选后的“剩余之人”和“被排除者”,也有数字旋风中的“数字工匠”和“用户无产者”<sup>⑨</sup>;既包括穷人之名的“诸众”和“多样性阶级”<sup>⑩</sup>,也包括依附于“云端资本”的“云端无产者”<sup>⑪</sup>,甚至还包括那些在贫民窟、难民所中聚集的被救济的力量。显然,西方左翼打造的这些政治主体已经不再是革命者的形象,而是宏大泛化的“人群”,“它比工人阶级的概念更宽泛”<sup>⑫</sup>。这些政治主体没有统一的信仰和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也不分种族、肤色与性别,更无反抗的意志和毅力,是一个完全异质的、极端多样的集合。这些政治主体的革命策略不是激进的革命,而是“从国家机关中出走”<sup>⑬</sup>,因而无法扛起共产主义大旗,无法担负起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① Aaron Bastani,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9, p. 50.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⑤ Göran Therborn, “The World and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Vol. 137, Sept/Oct 2022.

⑥ Jodi Dean, *The Communist Horiz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p. 78.

⑦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连线大脑里的黑格尔》,朱羽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76页。

⑧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49页。

⑨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吴静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50页。

⑩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New Left Review*, Vol. 120, Nov/Dec 2019.

⑪ [希腊] 雅尼斯·瓦鲁法克斯:《云端封建时代:串流平台与社群媒体背后的经济学》,许瑞宋译,台湾:卫城出版/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4年,第276页。

⑫ [意] 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⑬ [澳] 麦肯齐·沃克:《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姜昊骞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63页。

### 三、论题回归与中国方案：以中国道路破除西方左翼共产主义的迷思

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系统回顾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兴衰成败与实践得失，以强大的理论勇气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理性反思和激进批判，进而推出了形式多样的共产主义方案，在一定意义上扩写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新篇章。然而，西方左翼炮制的共产主义方案是带有奇点彩色的神话乌托邦、带有科技特征的技术乌托邦、基于网络批判的数字乌托邦或基于国家-形式批判的法权乌托邦。这些看似激进的共产主义方案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高阶社会形态，而是无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忽略公有制、抛弃分配制度、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无关人的解放的改良方案，最终沦为无法实践的虚伪的呐喊。反观当代中国，“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①</sup>。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开创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性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sup>②</sup>“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实践。”<sup>③</sup>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应该全面检审和批判回应西方左翼推行的共产主义“提早来临论”或“虚无渺茫论”，坚持历史辩证法，坚定道路自信，坚持政党领航，以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创造共产主义文明的中国版本和中国形态。

#### 1. 坚持历史辩证法：深刻理解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远景，是人类历史跃迁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既不像西方左翼期望的那样会“提早来临”，也不像历史虚无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虚无缥缈”，相反，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蕴含在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之中。人类社会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发展，这个过程体现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sup>④</sup>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是历史的高阶形态，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然生成，是“真正的共同体”，也是“真正人的生存条件”<sup>⑤</sup>。纵观当下，资本依旧“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sup>⑥</sup>，人类依然处于资本宰制的“物役逻辑”中，人类劳动依然没有摆脱资本的控制，共产主义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马克思早已认识到，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sup>⑦</sup>；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灭亡具有长期性，“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sup>⑧</sup>。列宁也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扬弃和超越资本逻辑宰制的高阶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sup>⑨</sup>。“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3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2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⑨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sup>①</sup> 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实现需要充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十分漫长且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sup>②</sup> 所以，共产主义既不会提早来临，也不是历史悬设，而是在资本主义经历由兴盛到衰落和灭亡的漫长时期、社会主义经历由低阶到高阶的漫长过渡和转变后才能实现的崇高理想。

## 2. 坚定道路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sup>③</sup> 共产主义既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是扎根现实且可以通过一个又一个奋斗目标达成的“实践性理想”，而不是西方左翼笔下的主观臆想、消极理念、虚无缥缈的幻景和神话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人宣扬所谓‘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过时论’，说到底，不是意识形态偏见，就是历史短见。”<sup>④</sup> 实际上，西方左翼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神秘化、虚幻化、技术化或观念化，归根到底在于他们抛弃了唯物史观，忽视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蕴的资本与劳动的辩证法，妄图把共产主义植根于人工智能、数字资本主义营建的智能社会，而不是从社会制度变革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视角思考共产主义的实践意蕴和现实方案，以至于最终陷入理想主义的泥淖。“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sup>⑤</sup> 共产主义真正的奥秘不在于空想空谈，而在于要从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认清它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共产主义并没有可供照抄照搬的母版或模版，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sup>⑥</sup>，相反，共产主义存在于一个又一个现实的阶段性目标的达成过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是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实践。”<sup>⑦</sup> 从理论谱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在实践中赋予其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sup>⑧</sup>。由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通达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sup>⑨</sup> 在当代中国，我们把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目标相结合，坚信“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sup>⑩</sup>，坚持“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sup>⑪</sup>，始终“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具体实践，以历史性成就、伟大的变革、宏伟的蓝图向历史和实践昭示：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①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40-541页。

⑤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⑦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41页。

⑧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5页。

⑨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36页。

⑩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2页。

⑪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0页。

### 3. 坚持政党领航：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共产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

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宏伟的蓝图和最崇高的伟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导向和领航。列宁指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sup>①</sup>。如果忽视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导向和领航作用，那么共产主义事业就会失去方向。显然，西方左翼学者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诸众”“无分者”“被排除者”“剩余之人”等新社会阶级的集体性抗议活动，主张以无畏的呐喊凝聚革命的力量。他们完全忽略了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引领前行的方向，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sup>②</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sup>③</sup>当代中国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锚定共产主义崇高伟业和远景目标不断前行，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改向、不走偏、不褪色，为共产主义事业注入中国底色和民族特色，为人类探索更加美好的制度和走向更加美好的社会提供了实践范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sup>④</sup>，始终坚持把最高理想与现实目标相结合，在实践中通过顶层设计擘画远景蓝图，通过实践探索不断完成近景目标，开辟了通往共产主义的中国之路，创造了共产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历史必然性与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统一论者，也是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结合的结合论者。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人类现代化模式的全新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sup>⑤</sup>中国式现代化既指明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也为人类迈向共产主义道路铺就了基石。

总之，共产主义既不像西方左翼乐观论者所宣称的那样正在来临或已经生成，也不像西方左翼悲观论者所宣称的那样虚无缥缈或遥遥无期。应当说，共产主义绝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世外桃源，而是生成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一个又一个接续推进的奋斗目标和历史过程之中。可以肯定，共产主义遥遥有期，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实践。

#### 参考文献：

-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 [2] 张亮、孙乐强等：《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 [3] 辛向阳：《“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

（编辑：刘曙辉）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2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3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02页。

⑤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页。